

# 社区治理的文化转向： 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 李世敏 ■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从“单位制”转换到“社区制”之后,城市社区诸多病症产生,学界对此开出了公民社会治理、多中心治理、合作主义治理等各种药方,然而鲜见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进行介入。本文在对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引入社区文化治理的概念,并通过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社区文化治理。最后指出,文化治理是一种自我规训,追求的是一种认同之上的矛盾避免机制,是一种从根源上的积极治理。

**【关键词】**文化治理;文化活动;认同

**【中图分类号】**G05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5]01-0119-04

10.13553/j.cnki.lygg.2015.01.030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中国市民由“单位人”转向“社区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行为越来越被“理性经济人”的思维和价值观所绑架,人与人之间相互疏离、冷漠。即便同处一个社区,彼此也形同陌路,市民对社区的感受仅仅停留在“地理”或者“行政区划”的意义上。对于绝大多数市民而言,社区远非它原本意义上的一个“温馨的社会共同体”。社区的个体化、碎片化和疏离化,导致社区治理一直挣扎于问题的漩涡之中。

学界对于城市社区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予了诸多理论关怀。有学者用“公民社会”的理论指导社区治理,指出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公民社会的力量,社区治理的选择模式应该以公民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王芳,2008);有学者指出“多中心治理”的出路,倡导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张政府、市场、社会、NGO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多中心治理同时强调组织与自组织的发展,提倡社区居民的参与性与组织性(吴理财,2010);有学者开出“合作主义”的处方,主张通过政府、社区居民、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等各种力量之间的合作和良性活动,来达到社区的善治。合作主义的理论 with 公民社会倡导的多元参与有几分相似,但它更多是倾向于法团主义式的,主张这种合作应该与政府权威紧密相连

(俞楠、张辉,2006);还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认为当下的社区治理应该致力于培养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从熟人社会社区自组织的角度进行破题(燕继荣,2010)。

尽管社区治理的理论层出不穷,然而鲜见有学者从“文化治理”的角度给予关注。目前学界从文化的角度对社区的研究仍然主要局限在社区文化层面,就文化本身而谈文化,尚未自觉地转换到治理的向度。本文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调查为例,从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三个层面,尝试用文化治理的理论开出社区善治的另一剂良方。

百步亭社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1995年由百步亭集团开发建设管理,是一个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于一体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占地3.5平方公里,下辖8个居委会,入住居民超过10万人。百步亭社区通过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文化治理”,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和谐社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等100多项国家级奖项。2013年9月,课题组一行20余人,到百步亭社区进行了为期10天左右的调查。

**基金项目:** 本文是吴理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18)的一项成果。

**作者简介:** 李世敏(1984-),男,河北省内丘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方政府和文化治理研究;吴理财(1970-),男,安徽潜山县人,政治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 一、文化活动“活化”空间

根据建设部颁发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规定,城市新兴居民区必须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中心,因此很多高档的、现代化的城市社区里面都建设了花园式的公共场地以及各类公共文体设施。然而,大部分社区的公共空间和文体设施往往流于一种静态的摆设,利用率不高,或者仅仅局限于零零散散的个体化利用,缺乏公共文化活动的展开。因此,绝大多数社区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存在一个“活化”的问题。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sup>[1]</sup>空间与社会密不可分,空间是社会的建构,社会也由空间所构成。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受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sup>[2]</sup>百步亭社区就是通过组织各种公共文化活动,让社区的公共空间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具有粘合剂的人际关系。

百步亭社区内有一句人尽皆知的口号——“社区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文化”。公共文化活动,需要借助一定的公共文化设施和空间,然而其最终得以开展的核心要素还是人。百步亭社区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在社区居民入住之初就派志愿者挨家挨户地调查个人的基本情况,比如兴趣爱好特长等等,然后分门别类建立档案。可以说,每个社区都有一批文体爱好者,每个社区都存在文化精英。与之相应的,每个社区都存在很多潜在的文体爱好者,只要有一些积极活跃分子率先站出来为大家服务,往往社区居民中会一下子冒出很多兴趣爱好者出来。百步亭社区的成功之处就是善于发掘潜在的文化精英,然后通过精英的带动实现社区居民文体兴趣的“组织化”。百步亭社区的很多群众文化组织都是开放性的、低门槛的,只要有兴趣的社区居民都可以参加。正如百步亭社区龙亭苑的一位负责人说的那样:“我们的老年合唱团不是很规范,不要求那么严格。不像老年大学,要声部、用气息啊什么的,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你能开口唱就可以参加”。

百步亭社区积极地笼络社区内的文化精英,为其提供免费场地以及各类展演平台等措施,鼓励他们出来建立各种文化团体。在社区文化精英的带动下,百步亭社区的各种文化团体不断涌现。从2012年开始,百步亭社区正式成立综合党支部管理社区文体队伍,其中文化队伍达到100支,体育队伍60支。有社区层面的鼓励、有精英层面的组织、有群众层面的参与,百步亭社区各种文化活动层出不穷。长年累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年文化、月文化和亭文化。

移植的、外来的公共文化展演难以整合和凝聚社区自身空间内的人际关系,而社区自身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公共文化活动则更容易吸引当地居民。恰恰是这种活动的本土性,贴近日常生活性,吸引了社区居民的更多参与。以2013年9月百步亭社区百合苑组织的“百合苑入住十周年庆典晚会”为例,整个活动从主持人,到上台表演者,以及台下观众都是本社区居民,晚会现场聚满了观看的社区居民。尤其是几个幼儿园小朋友表演的舞蹈“我有一双小小手”吸引了很多大人、小孩的目光,很多小朋友边看边对身边的父母说:“你看,那是我们班上的x”。

一次公开的文化活动就是一次小型的聚会,无数次的公共文化活动就培养了无数次的交往和联系。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不仅可以陶冶情操,缓解日常工作生活的紧张情绪,同时也可以加强社区居民的相互交往和联系,增加社区的社会关联度,以熟人社会来缓和社区居民和干部之间的陌生化导致的不信任。可以说,日常的公共文化活动起着生产社区社会资本的作用,而社会资本的增加则有助于社区治理。百步亭社区的8位居委会负责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用他们自己通俗的话语表达就是:“通过活动才能凝聚人,通过活动才会增加感情,增加感情以后什么麻烦事情都好做了”。

空间不是社会反映,而是社会表现、关系与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文化活动,社区公共空间内的小社会得以不断再生产。通过活动,不仅实现了社会内部空间的“活化”,同时也实现了现代性导致的各种脱域公共空间在社区的回归。可以说,通过各种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增加了社区的生活感,同时也强化了社区的存在感。

## 二、文化内涵重构价值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通过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等手段,将世界观灌输给被统治阶级,可以形成公众遵守的道德规范。<sup>[3]</sup>尽管他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揭露和批判,然而他对文化塑造道德规范的认知,却在其他时空中同样可以具有正面启示意义。

“文化不止是唱唱跳跳”,这个文化理念已经融入到百步亭社区的各个干部的日常工作之中。第三居委会张书记表示:“我们的活动不能只停留在健身这一块上,搞活动需要有文化内涵,我们的妇联主任也对我们说各个居委会不能光是唱歌跳舞打腰鼓,社区党委非常鼓励我们开展有特色的文化活动”。

只有具备深刻内涵的文化活动才能够吸引群众,只有具备深厚底蕴的文化活动才能够真正被打造成特色文化。于是,各个居委会在争相打造自己特色文化活动的同时,涌现出了很多颇具内涵的文化活动创新。

我上任时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教师和他乡下母亲因为婆媳关系经常吵架,影响了晚上邻居休息。大家一开始都主动劝架,但是后来我想我们这样光当消防员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观念上转变,人家出了事,你再来解决矛盾解决纠纷啊,我觉得停留在这还是不够的。假如我们把说改成夸,也许就能扭转这个局面,于是我就组织了一个“婆媳对夸”活动。湖北有句老话,婆婆身上背个鼓到处说媳妇,媳妇身上背个锣到处说婆婆。于是我们就别出心裁弄了一个鼓、一面锣,媳妇夸婆婆的时候,这边敲一下锣,婆婆夸媳妇的时候,那边就敲一下鼓,然后弄了一个竹排,上面一个门,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三居委会张书记

传统的孝道文化,通过百姓身边的真实经历改编成一种艺术化的公共文化活动,无疑吸引了很多社区居民的关注。这种文化内涵的正能量也传递到活动之外,事后一位社区大妈表示:“张太又在跟我们说媳妇不好,我说现在媳妇不像我们当年那个时候的工作是稳定的,铁饭碗,她们多难啊,再别说她们”。

了”。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孝道文化可以挖掘之外,助人为乐的精神也被应用到百步亭的社区文化活动之中。三居委曾经创作了一个“找金花”的情景剧,他们就取材地利用自己社区渔鼓队的力量,借用渔鼓的方式,演唱了一个“找金花”的故事。情节大致是,一个受助者的亲人来到社区表示感谢,说是要找一个叫“金花”的人,结果这个金花不是,那个金花也不是,在把每个金花助人为乐的故事讲了一遍之后,大家告诉他不用再找了,社区有一支金花志愿服务队,都是身边的志愿者,专做好人好事。这个情景剧,通过喜闻乐见的渔鼓形式,演绎了居民生活身边的故事,使得大家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颇受启发。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百步亭八个居委会的公共文化活动尽管形式各异,但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身边的好人好事进行改编,通过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公开展演。

为了塑造一种回归传统的社区文化氛围,百步亭社区从2002年开始推出“百家宴”,后来逐渐扩大到“千家宴”、“万家宴”。在春节时,每家每户做出一道菜在百步亭的文化长廊里搞一个聚餐仪式。在社区领导的提示下,大家都在每道菜上冠上文化之名。比如用菱角、鲤鱼、芹菜做成的菜肴取名“邻里情”,用虾仁做成的菜肴谓之“以人为本”,用豆腐、蛋清配芹菜的菜肴命名“雪中情”等等。一道菜就是一种文化,表达了一份情感。有些菜肴文化后面时常还蕴藏着一些社区内发生的真实故事,比如安居苑苑小组长在2003年除夕突然生病,当她从医院刚回到家,两个邻居就送来自亲做的饭菜慰问她,她在感谢之余,第二年做了“邻里情”这道菜宣扬暖人心的邻里情。

在社会道德风气日益下降的社会,追求社区内优良传统价值的回归,仅仅依靠口号与标语是不行的。社区文明行为的倡导,必须从简单空洞的宣传思维之中跳出来,采取潜移默化的文化方式,将一些文明理念融入到文化活动之中,通过喜闻乐见而又颇具内涵的文化活动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诚如百步亭社区有些干部所言:“居民常常认为我住不住你的,吃不吃你的,工资又不从你这里拿,凭什么听你讲大道理啰嗦”。只有运用文化嵌入性,将道德与价值融入生活,嵌入生活,它才能够真正发挥力量。

百步亭社区恰恰就是用公共文化活动这种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式,并赋予其文化内涵,让社区群众在文化享受的同时感同身受,在快乐之中潜移默化地达到了教育的目的。这个做法与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新村运动不仅是一场经济的现代化,还是一场生活伦理的训练和塑造。它通过将要提倡的生活伦理很好地嵌入到新村项目建设当中,很好地激发了村民“勤劳、自立和合作”精神。韩国总统朴正熙曾经倡导旨在推进农民自助精神的“国家重建运动”,运动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纯粹的精神运动是不够的”,他吸取的教训就是生活伦理只有通过具体行动才能提高,而不是通过纯粹的精神运动,他相信,一个微小的行动远比空洞的大话重要。<sup>[4]</sup>

### 三、文化符号建构认同

“进入百步亭后就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你”。很多

居民这样讲。但是,这种力量是什么呢?他们答不上来。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百步亭社区充斥着各种符号象征,不断地重复上演着各种仪式化的文化符号,正是它们构成了这种无形的力量。

符号(symbol)一词衍生于拉丁文 symbolum,其基本意思是标签(ticket)或象征(token)。符号要经过盛大仪式性的活动融入人心,通过人群振奋的激动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经过不断的重复,日常化为一个深刻的标志。国旗就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升国旗就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在百步亭社区,每逢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早上八点都举行雷打不动的升旗仪式。升旗时,有国旗护卫队,有升旗手、护旗手,气氛庄严肃穆。除了升旗本身之外,还举行国旗下的讲话。有时有社区干部演讲,有时由居民代表发言。演讲的主题有“幸福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丽社区我的梦”等。国旗下的讲话形式不断丰富,从单一的演讲,到后来的朗诵,唱歌,让社区居民觉得很有激情,感动,感人。

或许有些人认为升旗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形式,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过场,然而就如同原始人不知道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关联的人来到一起,就会释放出新的能量一样,通过一种集体的符号瞻仰仪式,参与的每个人都会发生转变,他们会体会到自身被提升,并见到与平常不同的生活。<sup>[5]</sup>原始人类以为这是符号所拥有的神圣力量,于是将之奉为图腾崇拜,然而这其实是现代心理学的作用。也许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聚在一起群体里的人,他们之中每一个人仍然是独立的,与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但是,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现代心理学认为,群体一旦形成,就立即有了群体的特点,“群体就像是一个活的生物,它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思想”。<sup>[6]</sup>

通过仪式聚合起来的方式,通过符号的狂欢展示,人们相互表明他们是一个共同体。仪式不仅表达了这种认同,而且再造了这种认同。<sup>[7]</sup>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符号和仪式,宣扬和深化了国家认同。国旗,作为一个国家符号,正是通过它实现了民间社会与国家疏离场景中的再度结合,它体现的是一种国家认同感。除了国家层面的文化符号所塑造的认同之外,百步亭社区也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社区符号。比如由百步亭社区自己的歌曲《和谐百步亭》,由歌曲家郭瓦·加毛吉演唱,郭瓦·加毛吉是国家一级演员,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副团长。这首歌优美高昂,经常在百步亭社区举行各种重大活动时作为前奏或者背景音乐反复播放。

百步亭社区还刻意塑造自己的“亭文化”,在整个社区内按照“百步一亭”的理念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亭,共建有200多个亭。每个亭都由居民题亭名、赋亭联,使每个亭子都充满了文化气息。亭,既是一种物理建筑,也是一种文化地景。无疑,文化地景具有形塑地方认同的功能。而塑造和形构地方认同,除了地方本身的独特样貌及其演变所积淀的意蕴之外,还往往透过特定形象的塑造、特殊意象的再现而构成和传递。<sup>[8]</sup>百步亭社区正是通过刻意塑造包装“亭”,将其打造成百步亭的社区意象。意象往往可以从视觉上的表现、观察,转换成心理的认知、联想。利用视觉符号的表征元素,可以呈现社区记忆与想象,从而建构社区独特、专属的品牌意象,<sup>[9]</sup>进而塑造社区认同。

社区一些特有的活动也经过不断地重复和固定,日益演化



成一种仪式性的符号。比如,在百步亭景兰苑有一个“家园日”活动,固定在每个月19号,定期举行。当天,整个苑区的居民都会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手里拿着塑料袋到院子里捡垃圾,清理社区的死角。最开始还有一个通知,后来持续不久,大家都养成了自觉的习惯,每到19号各家各户自动从家里出来清理社区平日的死角垃圾。可以说,“家园日”活动,已经成为社区居民认同的一种符号。除了国家与社区符号之外,百步亭社区还有一些鲜明的道德符号,其代表就是《好人之歌》。可以说,《好人之歌》在百步亭社区有着自己独特的意义,百步亭作为志愿者服务全国联络总站的所在地,一直主打志愿者的招牌,社区内注册的志愿者超过1万名。社区的好人好事不计其数,因此百步亭居民常常在各种场合哼唱《好人之歌》。歌曲的内容在百步亭社区居民看来就是他们身边的人和事。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互相帮帮忙,生活就少了风雨……”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老张小李;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大叔阿姨”。自从社区塑造了“志愿者”这个道德象征符号之后,百步亭社区最初被称为的“积极活跃分子”后来全部都改称了志愿者。

符号,通过特定的仪式,在定期的重复中建构和更新认同。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感。<sup>[10]</sup>可以说,百步亭社区的很多公共文化活动,就如同一次次简单的文化仪式,通过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断重复,社区文化符号得以不断展现,社区认同得以不断更新。

## 四、文化的治理效应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提出空间生产的三个分析向度: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实践”指社会脉络下支持性的空间构造,以及在这种空间构造里的人类行动;“空间再现”是指空间的呈现方式,是透过文字以及概念和思维方式呈现的空间;“再现空间”则指象征、无意识、情感,日常生活难以言说的感觉、身体、节庆狂欢,以及人类交往沟通的空间。<sup>[11]</sup>某种意义上,百步亭社区正是通过各种公共文化活动不断地进行着社区空间实践,通过文化活动的内涵来不断诱发社区空间再现,再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和仪式不断再现社区空间。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治理的三个层面并非割裂的、并列的或者对立的,很多时候它们是相互融合的,只是反映了文化的不同侧面而已。

文化,是经年累月积淀的结晶;同样,文化治理也需要时间的积累。文化治理不是三两天就能初见成效,它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而,一旦文化治理的效应形成,它将是持久的、全方位的。百步亭社区正是通过十多年的积累,从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等各个方面渗透文化治理,才最终形成了一种文化治理的场域效应。在这个场域里,人们不自觉地做好事,主动地抵制不良现象。从社会网的观点来看,场力并不是直接作用在行动者身上就决定了行动决策,而是透过一个行动者身旁的关系及社会网来作用,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接受了某一信息,会使此人也相信此一信息,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服从着某一规范,就使得此一规范具

有强制力,使此人也必须遵守<sup>[12]</sup>。就像百步亭社区三居委书记所讲的那样:“如果有人在百步亭社区摘花摘果,就会有居民告诉他们这样做不道德,你把花都摘了以后,你们家香了,但是树七零八落不好看。所以我们这里的琵琶,熟了之后像佛珠一样,金灿灿的,挂在树上,没有居民私自采摘,这个树上就写上了‘文明’二字”。根据现代参照群体理论,如果一个人把某一群体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参照群体,那么就会不由自主地运用该群体的规范来对照和约束个人的行为。<sup>[13]</sup>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到百步亭社区居住之后,一切行为都不自觉地、顺其自然地变得文明起来。

可能会有人质疑,百步亭社区的和谐治理并非文化治理一己之功,比如它的网格化治理也很出色。其实,文化治理并不排斥网格化治理或者合作主义治理等形式,相反它们可以共同存在,彼此相长。所不同的是,网格化或者合作主义等治理模式,一般所追求的是矛盾和问题发生之后的有效应对之策,是一种事后的回应性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一种消极治理;文化治理则追求的是一种源头治理,它要达到的是通过人们在文化享受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不自觉提升,是一种主动避免矛盾发生的积极治理。

现代城市社区是一个多元的、异质的社区,如果人们之间缺乏良性的沟通和彼此的理解,无法建构一个彼此认同的社区文化,那么冲突就不可避免。文化治理,是一种自我规训(self-disciplining),<sup>[14]</sup>它是一种基于认同之上可以主动避免矛盾发生的和谐治理模式。

## 参考文献:

- [1]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57.
- [2][8][11]王志弘.文化治理与空间政治[M].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1:77-79.
- [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书简[M].田时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
- [4][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M].潘伟光,[韩]郑靖吉,魏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40.
- [5][7][10][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91,472-473.
- [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2.
- [9]苏文清,杜瑞泽.社区创意生活产业之视觉符号意象开发与设计应用——以彰化秀水乡曾厝社区为例[J].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2009,(5).
- [12]罗家德,王竞,张佳音,谢朝霞.社会网研究的架构——以组织理论与管理研究为例[J].社会,2008,(6).
- [13]毛晓光.20世纪符号互动论的新视野探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1,(3).
- [14]黄孙权,成露茜.文化产业,文化治理与地方认同——以台湾新兴的嘉年华为例[J].城市与设计学报,2008,(2).

责任编辑:王建华